

新闻 研究资料

XINWEN
YANJIU ZILIAO



博古的新闻生涯

记先父林白水烈士

海外华文报刊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

历史沿革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四十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一九八八年三月

责任编辑：阎焕书

封面设计：曹辛之

G219.2-53

ZSX

436761-
70

2203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四十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60,000字

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04·0295·3/G·6 定价：1.10元

目 录

新 闻 界 人 物

博古的新闻生涯.....	王 敬 (1)
记先父林白水烈士.....	<u>林慰君</u> (27)
民初女记者刘韵琴.....	李西亭 (43)

领导机构与社团史料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历史沿革.....	王凤超 (45)
团结前进的五十年.....	
——记中国记协的战斗历程.....	钟 纪 (51)
我国早期的新闻界团体.....	马光仁 (61)

新闻工作杂忆

天外飞鸿

——从圣地延安寄往上海孤岛的两篇通讯	
.....	黄立文 (79)
一江山岛战役采访追忆.....	盛里予 (82)

国民党新闻业史料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史实简编

.....	汪学起 是翰生 (92)
台湾“报禁”来龙去脉初探.....	贺越明 (106)

海外华文报刊

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

.....方积根 胡文英(114)

报刊研究

《梧州民国日报》评述.....彭继良(130)

古代新闻业史料

古代报纸产生前的新闻传播活动

.....姚福申(143)

报刊史料

《海鸥周刊》始末.....戴美政(152)

解放前夕《西北日报》见闻.....郎次聪(163)

来去匆匆的《京华晚报》.....穆逸群(168)

清朝末年的北京报刊.....黄河(171)

抗战时期冀中的68种报刊.....杜 敬(191)

考订·补遗

《寰瀛画报》考.....葛伯熙(183)

关于“首先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

.....袁义勤(189)

中国新闻事业史报刊资料索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203)

《新闻研究资料》1987年要目索引.....编辑部(217)

博古的新闻生涯

王 敬

博古（即秦邦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政治家，曾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这为人所熟知；他是新闻工作者，对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却鲜为人知。他在1941至1946年，创办了延安《解放日报》，领导了新华通讯社，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根据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开拓出一条办党报的新路，并为新华通讯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他的新闻实践，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博古是江苏无锡人，1907年生。他18岁（1925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革命斗争的政治生涯。1926年到苏联去学习，1930年回国。归国后，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不久任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委、代理总书记。在1931年9月至1934年，他同王明一起，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经过长征，到遵义会议之后，开始认识错误，接受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对他仍委以重任，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野战政治部代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解放日报社、新华通讯社社长，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在1936年西安事变

时，曾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1946年2月，他又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同年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在黑茶山失事，和王若飞等同机遇难，称为“四八烈士”。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在《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一文中写道：“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且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的最杰出的导师和模范。”我们“丧失了一个最有权威的指挥官和最亲密的战友。”

人们沉痛地悼念博古，公正地评价了他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在博古从事新闻工作的五年中，由于他的精心擘划和指导有方，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已经形成了一套有系统的、统一的战斗机构。这个机构是由许多通讯社和报社组成的，在这个机构中，《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总社是它的神经中枢，各解放区的报纸和通讯社（当时有总分社9个，分社40余个）、地方报纸、部队报纸是其躯干脉络，而墙报、黑板报是其基础。这一机构，除了职业新闻从业员，还拥有近三万业余通讯员。这一机构，天天把人民的意见和活动集中起来，又传播出去，天天向整个解放区、全中国和全世界广播我党的主张，指出中国人民斗争的方向。它不仅是解放区人民的喉舌和武器，而且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喉舌和武器。在历史上，中国人民有这样一个全心全意为他们利益服务的、规模宏大的、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战斗的新闻事业，还是第一次，博古同志对于这一事业的创造性的贡献，确是不可磨灭的。

清凉山上的挂帅人

清凉山，屹立在延安城东北，隔着延河与宝塔山、凤

鳳山遥相对望。清凉山自唐宋以来，就是一座名山，18景24洞引人入胜，特别是北宋遗留的石窟雕刻，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万佛洞的浮雕佛像，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诗湾和仙人洞等地的石刻，使历史上不少名人的诗词、书法永镌于此，流传下来，抗日战争时期，这座宁静的文化艺术之山，在战火纷飞中更放异彩，成为名扬祖国内外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阵地。1941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这里诞生；新华通讯社也再度上山，在这里安营扎寨；中央出版局所属中央印刷厂（也是承印《解放日报》的印刷厂）的大本营，就设在半山腰的大庙和石洞里。三个单位的领导人都是博古，博古成了清凉山上的挂帅人。

博古学识渊博，下笔如神。过去，他写过不少文章，也写过关于如何办好报纸的文章，如1933年写的《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等，但他没有办过报，也没有具体做过新闻工作，从1941年起他才真正开始了新闻生涯。在此以前，他就有志于新闻工作，那是他在南方局和长江局工作的时候。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新华日报》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博古对此十分愤慨，到延安以后，他曾经对爱人张越霞谈过这个问题，他希望能在延安创办一张日报和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以便毫无保留地将我党主张传播到全国全世界去，揭露独裁者的阴谋勾当，帮助全国人民，使他们的眼睛更加明亮起来，他们的力量更加团结和壮大起来。”^①在党中央决定由他和杨松筹办《解放日报》的时候，他愉快而兴奋地接受了任务，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① 参见张越霞同志的《悼博古》。

之中。

《解放日报》的筹建，从1941年春天开始，这时正是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不但完全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应领的经费，而且更加紧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①。博古和杨松等有关干部、工人一起，在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克服各种困难，较快地完成了筹建工作。1941年5月14日，在新建成的解放日报编辑部窑洞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是崭新的两排石窑洞，面积约有100多平方米，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高标准的建筑物了。博古神采奕奕地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总编辑杨松外，还有丁玲、张映吾、曹若茗、王揖、杨永直等。博古向大家讲了党中央出版《解放日报》的重要意义，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一张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有鲜明的立场，政治上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事物的演变，文字要生动，写作反对公式化。”他还要求党报的工作人员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应该起模范作用。参加会议的人，心情都很振奋。虽然有的人没有做过新闻工作，有的人虽办过报，但经验不多，可是大家都有信心把这张党报办好。战争年代，时间就是战斗。总编辑杨松在会上宣布：明天试版，后天正式出报，这是紧急任务！博古带头拼搏，他既抓大事，又解决琐细的具体问题，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他拿着毛泽东主席为报纸题写的报头在编辑部征求意见：“这七个报头题字，选哪一个

^① 引自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见《毛泽东选集》847页。

好？”又到工厂去征求工人的意见。排字房设在万佛洞旁边的一个窑洞里，弥勒佛洞内是排版间。工人们纷纷发表意见，最后，博古采纳了排版工人刘立夫的意见。第二天，5月15日，试版的《解放日报》出来了，上面刊有毛泽东写的社论。送到党中央，基本上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中说：“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从此，博古便同党的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1年11月，新华通讯社也搬上了清凉山。新华社有新闻台、通报台、文字广播台和口语广播台。山上山下，收稿发信，电台机房日夜不停地收消息、发新闻，清凉山更加欣欣向荣。山上几十座土窑洞，是报社和通讯社工作人员的宿舍。印刷厂有些女同志住在大庙里，正面的泥菩萨依然正襟危坐，靠边的菩萨被“请”走了，人们便在他们的宝座上铺上千草和席子，象大炕一样，他们与神像为邻，与500罗汉为伴，欢声笑语，使古刹变得年轻了，充满了革命生气。入夜，清凉山灯火通明——尽管那是煤油灯、菜油灯和蜡烛的光，但那光是明亮的；石窟洞里手摇马达突突突的吼叫声，更给清凉山增添了生机。当然，最是生机勃勃的要数山上工作的人。博古忘我地工作着，他常对人们说：“我将终身从事新闻事业。在我们党领导下，已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还必须有很好的人民的新闻事业。”为了这

终身事业，他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患病之时，也倔强地拒绝休息。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在清凉山上，要同编委会的成员研究宣传报道，要找各种类型的人谈话，常常是早晨六七点钟起床，忙到十点多钟才洗脸吃早饭，就是吃饭的时候，也常常要同人谈话、看稿子。当然，更多的工作是在他的窑洞里伏案看材料，写稿子。他要看新华社收进和发出的电讯稿、《解放日报》的消息、通讯和社论，还要亲自动笔写社论。报纸创刊初期，每天都要发一篇社论，其中有关国际问题的社论，很多是出自博古之手。他文思敏捷，写文章旁征博引，才情横溢。常常是看完新华社收到的外国电讯稿，立即铺纸挥毫，遇到紧急事件，他就一边写一边送工厂赶排，几乎是写一页、排一页，全文起草终了，就能打出小样送审。他还常在清凉山上作报告，讲国际、国内形势，还讲哲学。他作报告没有稿子，可是材料丰富而准确，逻辑严密，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生动引人的文章。他作报告还能使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有一次，他给工人讲哲学课，讲完以后，让大家提问题，铸字工人刘玉生提了几个问题，博古一一作了回答，有一个问题刘玉生不同意博古的意见，博古听完刘玉生的意见后又讲，刘玉生再提，就这样台上台下讨论起来。这种生动活泼的学习风气，正反映了博古的民主作风。他不以领导者的权威和尊严去压服被领导者。

博古的工作重点虽然在《解放日报》，但是对新华社的工作也并不放松。主持新华社日常工作的副社长吴文藻，刚受命的时候有点畏难情绪，博古同他谈话，鼓励他克服困难，和同志们一起，努力使新华社成为解放区的新闻总汇，

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党中央要根据咱们收来的新闻电讯决定政策的。可不要再发生‘两个大西洋宪章’的现象啦！”

“两个大西洋宪章”，是指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大西洋上公布的那个政策声明，由于新华社发给《解放日报》刊登的声明内容有些差错，与重庆《新华日报》刊登的稿子出入很大，几乎成了两个不同的文件。博古敲起这个警钟，更促进了吴文焘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吴文焘每天下午或傍晚，总要到博古办公窑洞里汇报电台刚收到的重要新闻，博古据此分析国内外形势，并且向中央反映。博古经常同吴文焘讲：办报、办通讯社，就要随时准确地了解时局的动向。博古不但看电讯稿、听汇报，而且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亲自到新闻台去了解情况。他精通俄文和英文，能够直接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最紧张的关键时刻，他多次到新闻台，星期日也不例外，拿走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所有电讯稿，及时送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写的那篇当时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①，就是根据博古及时提供的资料，作出判断，并很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②。每当国内外发生特大事件的时候，每当党中央公布重要文件或中央领导同志发表重要文章的时候，中央办公厅或中宣部就给博古打电话，有时毛泽东亲自给博古打电话，提出对文章修改的意见。整个清凉山，如同一个活的肌体，报社、通讯社、工厂，配合协调，社长、总编辑、编辑、工人、校对、收发报员……都在忘我地工作。他们把全世界的声音、信息收集来，把延安的声音传

① 在《毛泽东选集》中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见847页。

② 参见吴文焘《清凉山怀旧》。

播到全国和全世界去。

对中央印刷厂的工作，博古也煞费苦心。纸和油墨是印刷上必不可少的物资，可是当时在延安非常缺乏。《解放日报》第一期用的是好白报纸，这纸是冲过层层封锁线，好不容易运到延安的，要存上一些留着重要节日、纪念日或者中央发表重要文件的时候用，平常日子就靠当地用马兰草造的马兰纸。马兰纸颜色发黄，粗糙易破，一沾水就成了一堆纸浆。纸在上机印刷前，工人们一张一张地检查，如果有破损就把它一块块地修补好。油墨本来就紧张，马兰纸吃墨量大，于是又想办法就地取材自制油墨。先是用松香、烟灰、蓖麻油合制而成，但质量不好。后来改用延长县石油厂的渣油烧烟灰，这样一来，油墨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就都解决了。没有电力，工人们就轮流摇马达；照明的汽灯如果失明，排字工人就一手举蜡烛，一手拣字，有时印刷件要求急，工人就通宵达旦地挑灯夜战。当年延安出版的每一张报纸，每一本书，都闪烁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光辉。而博古不仅是不嫌繁琐地指挥大家解决以上的种种困难，而且作为中央出版局局长，他还做了不少有价值的翻译工作，对传播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贡献。他译过《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博古对待其他工作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且充满热爱。他曾有一个雄伟的抱负：要亲自把古典名著翻译出来，还想把所有的译本重新加以校改。

百年积弱叹华夏
八载千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做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

这是陈毅同志对清凉山的评价。而清凉山的挂帅人博古同志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实干精神，三付重担一肩挑，朝气蓬勃地带领大家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惊人地主宰了时间，创造出大量的精神财富。

党报新路的开拓者

党在革命根据地办大型日报，《解放日报》是第一张；博古本人从事新闻工作，也是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在那国际国内风云巨变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既是打击日寇的有力武器，又是对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的宣传工具，还是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反映群众的活动和呼声的主要阵地。怎样才能出色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不但是摆在博古面前，同时也是党中央所考虑和探索的问题。从1942年3月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博古经历了激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以极大的努力，开拓了一条办好党报的新路。

整风——改版——自我革命。

《解放日报》创刊后的10个月中，尽管博古十分辛苦，工作也有成绩，可是报纸办得并不令人满意。博古缺乏办报经验，又没有对中共党报进行研究，总编辑杨松和副总编辑余光

生也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整个领导班子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了解不够深刻。当时人们头脑中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尚未肃清，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因此，报纸宣传中不断出现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博古认为《解放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是大报，不能象过去在苏区打游击时办小报（如办《红色中华》）那样，只登自己党政军民的活动，而应该着眼全世界，要把国际新闻放在首位。于是，在版面上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规定：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地（延安市）。《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到同年9月14日，报纸是对开半张两个版，第一版基本上是国际新闻，第二版也有一半以上是国际新闻。1941年9月15日以后，报纸改为对开一张四个版，第一版主要是国际新闻和有关国际问题的社论，重点是苏德战争、欧洲战场，一小部分是国内要闻和有关国内问题的社论、文章；第二版是国际版；第三版是国内新闻版；第四版上半版是边区版，下半版是副刊。国际新闻在版面上占绝对优势，在位置上也极为显著。从1941年5月16日至11月16日的统计来看，一版头条刊登国际消息共180次，国内消息仅4次，其中还有两次是我党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和声明。当时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没有一个驻外记者，报上刊登的国际消息，都是照登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同一条新闻，写起来各有各的立场，照登几家通讯社稿有时就会互相矛盾。而对于自己党政军民活动的新闻，采用的数量既少，所放位置又不显著。毛泽东同志加了按语的、关系边区军民生活大事的运盐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只发在二版的下面，而当天的一版头条却是《在赴冰岛途中美轮又被击沉》，两相比较，孰轻孰

重，一目了然。特别是1942年2月全党开展普遍整风运动的初期，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解放日报》的宣传很不得力。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三风的演说^①，这是向全党作开展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而《解放日报》只在第三版的右下角发了一条三栏题的消息。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解放日报》也同样在第三版的左下角登了一条三栏题的消息。

《解放日报》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不满，纷纷来信提意见。读者罗李王来信说：“把贵报各版读过以后，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即立论空泛，和我们建设边区的实际工作，似乎相距太远了些。今后应该痛改这种作风，应该使读者具体了解我党的政策，将边区各方面工作好的与坏的经验传达给全党。”读者李微提出：贵报刊登的异常丰富的关于国际问题的材料，我是很难看懂的，这些大量的材料，对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联系很少。邱吉尔、罗斯福说什么话，日寇怎样轰炸新加坡等等，这一些国际大事情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光登这些内容，并不能回答我每天碰到的困难问题。许多读者来信建议边区版应该扩大版面，提高质量，多多反映党政军民的生活，特别是民间的疾苦与工作中的缺点，“我们要建设边区并提高其效率，就应当不掩饰缺点，而应当揭发各种落后不法的行为”。有的读者对社论提出意见：每篇社论都应值得读者去深思精读，不要拼大题目，作空文章，不要拼凑概念，滥调连篇，不要拘于形式，泛泛而谈，而要言之有物，深入实际，解决问题，提供方案，明快

^① 在《毛泽东选集》中题为《整顿党的作风》，见第769页。

透彻，生动有趣。读者张宣提出：《解放日报》应该成为反对党八股的模范，只有作为模范者，才能成为先锋。

读者的批评，给博古和编委成员敲响警钟，他们也曾几次开会讨论，但都是就事论事，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报纸改进不大。博古是严于责己的人。在遵义会议，他接受党中央的决定，从代理书记岗位上下来，党分配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而且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过遵义会议只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没有来得及清算其在政治路线上和组织路线上的错误。博古对自己在军事上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感到痛心，而对于自己的思想，也没有认真加以清理。他是个乐观主义者，热爱工作，热爱生活，正如埃德加·斯诺笔下所描写的那样，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快活的革命者。斯诺同红军的上层人物交往很多，他的土炕成了“上层人物的聚会场所”，灯下打扑克，成了大家喜欢的文娱活动，博古、李克农、凯丰、洛甫都去玩。有一次，独臂将军蔡树藩一个晚上就从博古那里赢去“12万元”，经大家仲裁，博古从“国库”中提出12万元给蔡树藩，蔡必须用这笔钱买飞机……输来赢去，公款、飞机全是火柴梗。斯诺还知道博古家里有一罐可可，就想方设法弄了出来大家品尝；而当他要离开“红色中国”，大家给他送行的时候，博古却没忘记提醒他想着“把四两可可送回来”！《西行漫记》中博古的形象，正是遵义会议后第二年博古的真实写照。通过一些细小而有趣味的事情，来写博古的幽默、诙谐和情趣，更见其真实生动。在清凉山上，人们都知道博古犯过严重错误（当时是“王明博古”并提），可是谁也没有因为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而不尊重他，因为人们亲眼看到的博古是辛